

將時間撥回2009年，那一年胡安焉30歲。彼時的他，並非意氣風發的青年作家，而是一個在職場中傷痕纍纍的「失敗者」。「我之前二十幾歲的時候，人生經歷、工作經歷、社會經歷都不太順利。」胡安焉坦言，語調平靜卻透著一種歷盡千帆後的澄澈。到了30歲這個節點，各方面的壓力與狹窄的求職選擇，讓他對當時的人生感到絕望，「很難會有什麼太好的出路」。

通過寫作建立自我價值

他剖析自己的「失敗」並非偶然。內向、過度敏感、在人際相處中極易受到精神負累——這些特質讓他與主流職場格格不入。「我做不了銷售，」他舉了一個在廣州北京路服裝專賣店的例子，「只要顧客流露出一絲否定，我就沒辦法堅持。對我來說，如果一直堅持是在強迫別人，被拒絕是一件非常羞恥的事情。」他無法與同事爭搶客戶，也無法向僱主爭取利益，甚至連面試都要在確保自己條件「充分達到並超過要求」後才敢前往。「我害怕失敗，害怕挫折，寧願降低自己的慾求，去克制自己，而不是去挑戰。」

28歲到30歲間，他在南寧經營一家女裝店，與同行的惡性競爭讓他精神備受傷害。在種種擠壓之下，胡安焉做出了一個近乎「退場」的決定：他不想再走那條大多數人所選擇的、高度社會化的道路——掙錢、成家、買房、生兒育女。「也可以說我認輸了，被打怕了。」他承認。

然而，認輸不代表放棄。他急需一個精神寄託，以防止自我的徹底崩潰。對他而言，在工作縫隙間的閱讀與寫作，不是風花雪月的文學夢想，而是出於一種「必須如此」——在充滿挫敗感的生活，抓住一片浮木，找到一種支撐，「建立一種自我的價值感」。「起碼我有一個東西，我是全身心地、純粹地投入進去，去積累。」他不求掙錢或出名，只求在自我認知中，這一生不至於「一無是處，白活一場」。

選擇寫作，既是這種內向驅動的結果，也源於早年埋下的種子。2003至2004年他加入漫畫社結識的文藝朋友，以及在開服裝店痛苦時閱讀的陀思妥耶夫斯基、卡夫卡、塞林格，都為他打開了一扇門。「我覺得這個事情不錯，它能讓我覺得自己這輩子沒有白活。」他帶有一種近乎偏執的想法投入其中。文學將他與現實隔絕開，他初時於是將文學看作是現實的對立面——現實是骯髒的，而文學無比崇高。「我通過貶低傷害過我的現實生活，來抬高藝術的價值，來克服自卑感和對失敗人生的挫折感。」他最初的作品充滿了傷痛，素材皆源於此前人生中那些羞恥與挫折的經歷。

生活是藝術的主體

然而，這條精神救贖之路並非坦途。2009年辭掉工作後，胡安焉靠積蓄在廣州父母家「啃老」了一年半，專心閱讀和寫作，奠定了文學基礎。但積蓄總有花光的一天。2011年，他開始開淘寶店，卻陷入了寫作與生意「兩不像」的困境：寫也寫不下去，店也做不起來。彼時他租住在廣州三元里的城中村，每天往返於火車站、服裝市場補貨、拍照、做客服，還要處理棘手的「中差評」，同時心繫文學論壇。這種「一邊說着『親，你好』，一邊讀着卡夫卡」的分裂狀態最終難以為繼。

2012年下半年起，他停筆近兩年。從雲南的商場保安、烘焙店學徒，到上海便利店和自行車店的高強度工作——在那個著名的美國自行車品牌專賣店裏，他每天工作13到14個小時，下班後還要學習騎車、遛店裏的狗。「完全沒有辦法兼顧寫作，連閱讀都很難。」但他坦言，當時並不焦慮，「我覺得挺好的，這些經歷、工作、掙錢、騎車，就是意義所在，它們在當時比寫作對我的意義更重要。」

正是這些跌跌撞撞、時斷時續的經歷，重塑了他

從快遞員到作家

胡安焉：在文學中尋得精神寄託



●胡安焉早前造訪香港，接受了香港文匯報專訪。 記者尉瑋 攝

2023年，一本名為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的非虛構作品橫空出世，迅速登上各大圖書暢銷榜，引發了廣泛的社會討論。這本書的作者胡安焉，也因此從一個默默無聞的前快遞員、打工人，一躍成為備受矚目的文學新星。

然而，在這份突如其來的成功背後，隱藏着一個關於挫敗、逃避、堅持與自我和解的漫長故事。

近日，胡安焉受香港國際文學節之邀來港與讀者分享創作心得，其間接受了香港文匯報專訪。在訪問中，他回溯了自己二十多年來的人生軌跡與寫作心路，揭示了一個「內向者」如何在現實的夾縫中，通過文學尋得精神寄託，並最終被世界看見的複雜歷程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寧



●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於2023年推出英文版本。 香港國際文學節供圖

對文學與生活的看法。「我現在認為，生活本質上就是藝術的主體。藝術是一個人自身氣質、品格、感受、思想的內在東西的語言化體現。」他引用貢布希與高爾基的觀點，認為「沒有藝術這種東西，只有藝術家」，而「文學就是人學」。寫作不再是對現實的逃避，而是對自我的誠實面對與深入。「寫作不是技術性問題，它本質上是個人本性的問題。你是什麼樣的人，決定了你能寫出什麼。」

從豆瓣日誌到現象級暢銷書

真正改變一切的，是2020年4月。當時失業的胡安焉將2017至2018年在廣東順德某物流城做夜班理貨員的經歷寫成文章發在豆瓣，卻沒想到，這篇回憶錄在豆瓣上引發了現象級的關注和討論。數十萬的閱讀量、大量的轉發評論打賞，讓他第一次真切地感受到一種「被看到」的衝擊。「那是我最驚訝、最激動的時刻，完全吃不透這個事情。」

隨後，一個名為「副本製作」的藝術團隊聯繫了他，團隊中的編輯之一正是胡安焉早年混跡文學論壇時就欣賞的作者。來自「知音」的鼓勵至關重要，他應約寫下了2018至2019年在北京兩家快遞公司的從業經歷，後來被發表在著名的Mook《讀庫》上。

最終，這些文字吸引了出版方的注意，經過近三年的打磨，收錄了他從快遞員、自行車品牌店員到保安、烘焙學徒等19份工作經歷的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於2023年問世。其引發的社會反響遠遠超出了胡安焉最悲觀的預期——「我一開始希望它不要虧錢就好」。它不僅成為暢銷書，更斬獲諸多獎項，還被許倬雲等文化名人推薦，甚至出版了英文版。

「非典型的快遞員」

對於讀者鋪天蓋地的反響與共鳴，胡安焉感到溫暖。許多來自完全不同職業的讀者告訴他，在他的描述中看到了自己，這對他是一種治癒。但他內心最珍視的，是那些能透過文字辨識出他「個人特殊性」的理解。「很多人認為看這本書是看一個快遞員寫自己的經歷，帶有獵奇性。但極少人能認識到我不是一個『典型的快遞員』。」他說，「能察覺到這一點並給予肯定，才是令我最感動的。」

他也坦誠面對由此帶來的複雜心境。對於書名帶來的行銷效果和巨大成功，他充滿感激，認為正是這個「世俗」的標籤，讓他這個「塵埃」般的小人物有了被看見的機會。但同時，面對許多才華遠勝於他卻未被發現的寫作者朋友，他內心常懷「羞愧」。「我深知這裏面的不公平。但作為一個成熟的人，你必須接受。」順利時得意忘形，不因外部認可而高估自己，是他對自己的告誡。

如今，他的「生活三部曲」——《我在北京送快遞》、《我比世界晚熟》和《生活在低處》已先後問世。從第一部的職業經歷，到第二部的性格心理成長，再到第三部偏向文體實驗的寫作梳理，這並非預先規劃，而是他被命運裹挾着、一步步走來的真實印記。對於未來，他坦言自己無法像專業記者那樣去採訪、調查，持續進行非虛構寫作。他的興趣始終在小說，在那些如塞林格、卡夫卡、契訶夫一樣能帶來生命感受共鳴的文學世界。

「如果我當時沒被編輯發現，還會繼續寫嗎？」面對這個問題，胡安焉沉思後回答，「大概還是會像以前一樣，工作與寫作交替進行。當對工作厭倦了就去寫，寫厭倦了又去打工。寫作的衝動源於內心的呼喚，而非外部的堅持。『如果沒有這種內心的衝動，我可能不會勉強自己，會在其他方面建立對自我價值的認可。但那會是比現在更漫長、更困難的一條路。』

不只是音樂

作者：黃志淙
出版：突破



資深廣播人黃志淙的著作《不只是音樂》，回顧其四十年的電台旅程與Chi Chung's Choice的選樂堅持，記錄香港樂壇黃金時代與國際音樂節遊蹤。書中不僅收錄與坂本龍一、David Bowie等巨匠的珍貴交會，更透過Side A「生命之歌」與Side B「給坂本龍一」，譜寫出時代記憶與個人生命交織的Soundtrack。俞琤、鄭秀文、吳俊雄等多位名家至誠推薦，是資深樂迷不可錯過的文化紀實。

蘋果之道：重新定義世界的50年

作者：大衛·波格
譯者：林俊宏、黃瑜安、廖月娟、林子揚
出版：天下文化



本書不只記述一部企業傳奇，更描繪出人類溝通、消費與創作方式的進化史。本書作者、科技觀察家大衛·波格詳實梳理蘋果半世紀興衰，深度採訪超過150位橫跨各個時代的核心人物：從共同創辦人沃茲尼克、與賈伯斯決裂的史考利，到主導蘋果設計靈魂的強尼·艾夫。蘋果不干預寫作，首度開放多位高階主管與設計師接受專訪。波格藉此公開這門最具爭議、也最受愛戴的公司，如何從兩個人、一間車庫的魯莽創業，演變成觸及全球超過22億人的商業帝國。

世界會辜負你，美食不會

作者：李純瑀（魚小姐）
出版：平安文化



俗話說「吃飯皇帝大」，吃不只是我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行為，同時也是觀察一個人素養的重要切入點。對於娛樂匱乏的古代人來說，飲食不只是糊口，更是一場充滿享受的靈魂盛宴。知名的古代文人們，即便窮愁潦倒、顛沛流離、鬱鬱不得志；或是沉浸於自己的快樂小世界，都會想着要吃上一口該吃的、好吃的、喜歡吃的。畢竟，感官的爆炸，是更加即時的慰藉。李純瑀用最有趣的知識、最浪漫的視角，帶你細細品味古代的珍饈，以及潛藏於其中的生命之味。

餘生皆為贖罪：漫畫普利摩·李維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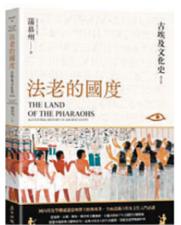
作者：馬提歐·馬斯特拉戈斯蒂諾、亞歷山德羅·蘭加斯基
譯者：黃好萱
出版：衛城出版



他不是歷史的倖存者，而是亡者的守墓人。從奧斯維辛集中營死裏逃生的李維，在最殘忍的時刻，仍然看到希望與良善的枝芽。他見證了冒死反抗的英雄、冒着入獄風險而提供照顧的石匠，以及困在集中營卻伸出援手的學友。即便身旁的人一一死去，李維依然掙扎求生，只為了把故事傳承下去。多年以後，當世界快速復原、正常生活再次運轉，李維卻依然被記憶困住。在他心中，戰爭並沒有結束，只是沉入日常。比暴力更可怕的，是人們遺忘得太快；比死亡更刺痛的，是他雖活着回來，卻永遠無法再成為原來的自己。本書不僅描述罪惡，更攸關一個人在破碎之後如何繼續相信人性。

法老的國度——古埃及文化史

作者：蒲慕州
出版：麥田



本書從第零王朝開始，書寫古埃及文明的發展大勢與特徵，帶領讀者遊歷其中的迷人之處：雄偉的人面獅身像、才情各異的法老、鮮艷如故的壁畫、細膩優美的文學、講述日夜與重生的神話、莊嚴肅穆的宗教儀式……古埃及的精彩與驚奇，宛如天空神女身上的星辰，閃耀、雋永且不可勝數。除了走進古埃及的內在，本書也將目光投向尼羅河流域之外，概述其與巴比倫、以色列、波斯等周邊政權的交流碰撞，以及歷代文人對古埃及的興趣與探索，最終匯流成「埃及學」的漫長過程。讓我們翻開書頁，循着現存遺蹟、重大事件與時人觀點，再次聽見法老與他的子民，自歷史長河彼端傳來的悠遠回音。

放心把世界交給孩子——讀梁鴻《要有光》

書評

●文：韓浩月



《要有光》
作者：梁鴻
出版社：中信出版社

因此，一個被遮蔽的、被大人世界所忽視的、為主流社會所不認可的孩子們的世界與網絡，通過《要有光》這本書得以系統化地呈現在更多讀者面前。他們說，「別吹滅那光」「媽媽，你得繼續學習，你得知道人類創傷的複雜性與必然性」「在歷史性的選擇中，你們都沒有選擇我」「這個世界上沒有普通人，大家各有各的軌跡」……閱讀這些話語，發覺這些孩子們會悲秋傷春，喜歡寫信寄明信片，願意從遠方得到安慰——這些都曾是他們父母的習慣或愛好，但在哲學層面上，對人生意義與生命價值的思考上，這些孩子們在集體層面上，展現出了超越前代的潛在特質。

這是一件幸運的事情。在大人們把孩子帶離大自然、脫離大群體、失去攀爬山仰望星空能力的時候，他們還是可以憑藉某種生命本能，繞過一道道障礙，通透地看到世界的過去與未來。他們能找得到自己的位置，能覺察到與生俱來的幸福與痛苦。他們懂得如何做判斷與選擇，在獲取文化與歷史留下來的經驗的同時，也會依據豐富而發達的感官，來與世界上已知與未知的一切重新建立聯繫。所以，放心把世界交給孩子，讓他們找到並擁有自己的光，這是大人們必然要做的、不得不去做的一件事情。

寫「梁莊三部曲」的梁鴻，在出版長篇小說給人留下向虛構轉型的印象之後，再次回歸到非虛構領域，寫作出版了主題為親子關係、家庭與校園教育的《要有光》。和《中國在梁莊》等故鄉主題還蒙著一層溫情面紗不一樣，寫《要有光》的梁鴻筆觸深入而鋒利，在悲傷的基調上瀰漫著對尋找真相的執著。這本書是一次情感傷口的展示，是心理紫外線、精神消炎藥共同作用後，創傷癒合過程中，每一位讀者都能感受到的痛與愛的集合體。

《要有光》在「前言」中講述了一個震撼的景象：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將額頭頂在耶路撒冷的哭牆上，默默訴說內心的悲痛，淚流滿面的作者亦是其中一員，「他四面都是牆壁，無處可去」「他好像被什麼困住了」「我的孩子，他在受苦啊」「我自己可能就是痛苦來源之一」……一位寫作者能如此開門見山地袒露心聲，這往往意味著她的寫作已經帶有破釜沉舟的勇氣，當自省與警醒合二為一的時候，她想要發現與解決問題的決心便無可阻擋，而眾多同因此局的父母，往往在發現問題局面局限於片面，在解決問題上更是束手無策。

首先要看到大人的掙扎，才能洞察孩子們的痛苦。《要有光》在書寫敏敏、雅雅、小夏、吳用等少年在黑暗中無助、徘徊的經歷時，也帶出了他們身邊父母親人的群像。如果說孩子們的遭際使人憐憫、同情，那麼他們父母輩、祖父母輩儘管狀態糟糕，卻也令人難以苛責——他們由焦慮、膽怯、狂妄、卑微等等構成的創傷，何曾是他們想要的？如果大人們不自知，又怎麼寄希望於他們能理解、解救、成全孩子？

在閱讀《要有光》時，最常想到的是，「鏡中我」作為社會學概念、同時也被心理學廣泛借鑒的理論，於這個時代在持續被驗證的同時，也在不斷被年輕人的自我意識如海浪般地衝擊着。一

方面，家庭作為促使孩子自我認知生成的第一場景，在對孩子的影響和塑造方面，與過去相比，有過之而無不及——家庭小型化帶來的人際關係單一、親密關係雷同，壓縮了孩子們對外界的探索與聯繫，在窘迫空間裏，兒童客體化狀況愈加嚴重；另一方面，數字與智能時代造就的量子化生存，讓孩子很早便習慣離散式聯結，有了明顯的自我意識重構，哪怕只有十幾歲，他們也有了帶有超越性的意識覺醒，較之前幾代孩子，個性與自我更加鮮明。他們與父母長輩間的衝突，是不同代際間截然不同的認知隔閡導致的。除非父母長輩能夠真正放棄自己擁有的知識與觀念，以孩子們的視角去觀察和感受這個巨變的世界，並以平等的身份與口吻與之交流，否則問題就不會消解、融化。

得到這一發現，是因為《要有光》中的書寫，已經客觀證實孩子們早已通過有形（電子設備、社交平台）無形（自我意識、共同觀念）的網絡，構建了屬於他們的世界。雖然孩子們的世界仍然與大人眼裏的現實世界有一定的重疊與交叉，但仍不能將孩子們看到的、感受的、身處的環境視為超現實世界，他們在被迫地學習、繼承、融入由超前理念與超前技術構建的新世界的過程中，顯然已經帶入了自己的主人公思維，在這種思維裏，所謂的不合時宜的關心與愛，均變成了控制與暴力，表面上看大人們是因為孩子的不聽話而覺得痛苦不堪，實際上是對孩子們所掀起的無聲的「革命」產生恐慌——他們擔心自身所理解的美好社會與生活方式被顛覆，哪怕他們所享受的快樂與幸福，也是經過上百年來一代代年輕人的抗爭才得以建設而成的。

梁鴻在接受訪談時曾表示，書中所使用的孩子們的話語，包括他們所寫的篇幅或長或短的書信，她均沒有作修飾與昇華，哪怕字詞語句層層存在所謂的錯與病，也都原汁原味保留下來了。